

《歌谣》周刊中儿歌的创作理念探究

史雨娟

中国海洋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青岛 266100

摘要：北京大学发起的歌谣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重要实践，其核心成果《歌谣》周刊长期被学界视为民俗研究范本，但其在儿童文学现代性转型中的独特价值尚未被充分挖掘。本文以该刊儿歌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以儿童为主体、以涵养美德为目的、以民俗为媒介”的创作路径，阐释儿歌的现代性表达及文化意义。《歌谣》周刊的儿歌创作以“儿童本位”理论为内核，通过拟人化叙事与娱乐性语言重构独立于成人世界的儿童主体性话语。以涵养美德为创作目的，通过知识传递与童趣审美的融合，将自然意象和生活化场景相结合，在诗性表达中完成儿童天性的解放。而民俗媒介则展现出双向功能，既以地方性习俗守护文化根脉，又以底层书写关注社会大众现实生活，回应社会变革诉求。

关键词：北大歌谣运动；《歌谣》周刊；儿歌；创作理念

朱自强曾为儿歌下定义：“儿歌就是指民间流传的或文人拟作的供儿童咏唱的歌谣。在古代，人们多采用‘童谣’称谓，在现代，人们则多采用‘儿歌’的称谓^[1]。本文采取“儿歌”这一称谓。儿歌在儿童成长过程中打开了儿童视野的第一扇门窗。幼儿自诞生的那一刻，在母亲轻轻哼唱的摇篮曲下茁壮成长，儿歌作为文学作品的一种形式，自然地进入孩子们的童年，让他们获得最早的知识启蒙和精神陶冶。

北京大学以搜集并研究民间歌谣为主要目的开展了北大歌谣运动，引起了对民间文学的关注与重视。目前学术界较为广泛认同的观点认为，刘半农与沈尹默一次散步提出征集歌谣的想法，成为了民间歌谣搜集运动的关键起始点^[2]。而从时间上论的话，鲁迅与周作人在提倡“征集民间歌谣”方面实则更为前瞻，1913年鲁迅便在《编处月刊》发表《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于文中率先倡议搜集民间歌谣^[3]。北大校长蔡元培受鲁迅先生见解的启发，先前便萌生了搜集近世民间歌谣的设想，后刘、尹二人的参与，为这一构想的实现提供了契机与动力。《歌谣》的办刊宗旨阐明搜集歌谣的两个目的——即学术的和文艺的。北大歌谣运动及《歌谣》周刊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于民间儿歌的搜集研究是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一场新的文化变革运动。

作为中国儿歌发展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一方面，晚清时期童谣的迅猛发展依然在延续，另一方面由于各种文化思潮对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冲击，促进了现代儿

歌观念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基础的形成，确立了与其他历史时期不同的现代化特质。该时期儿歌的现代性特质始终贯穿于其创作理念之中，本文以北大歌谣运动的产物——《歌谣》周刊搜集的民间儿歌为对象进行分析，探讨儿歌中蕴含的创作理念。

一、儿童本位：成人视角到儿童视角的转移

在传统思想观念里，中国几百年以来始终遵循着“父为子纲”这一封建教条，而儿童往往作为成人的附属品，其独立的思维和个体意识被埋藏。直到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第一声呐喊。这一呐喊反映了社会对儿童问题的深刻关切，也揭示了儿童在传统社会中所遭受的压迫与忽视。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儿童的发现”不仅是一个关于儿童本身存在意义的觉醒，更是一场深刻认识到并将儿童视为拥有独立人格与尊严个体的思想革命^[4]。该时期的儿歌正是立足于“儿童本位”，重视儿童这一群体的精神层面和生命层面。

在新文化运动倡导的“儿童本位”理念影响下，《歌谣》周刊对儿歌的系统收集体现了一种主动寻求和珍视儿童纯真天性的文化自觉，这一行动超越了既有的现实局限，为展现儿童真实面貌开辟了新的路径。例如儿歌《猫哥狗弟》^[5]：

“猫哥狗弟，相敬致礼；/你躲门外，我缩门底；/你守金银，我管谷米。”

猫狗的关系从成人世界定义的势不两立的敌我两方，转变为了孩童世界中“猫哥”负责镇守金银宝库，“狗

弟”则负责保卫粮仓这样和谐互助的亲友兄弟，这是一份纯属于儿童世界的天真和单纯。

传统的儿歌往往是成人为儿童创作的，内容和形式多受到成人审美和教化的影响。《歌谣》周刊中的儿歌真正地“发现儿童”，汲取民间文学的养分，更多地注重从儿童自身的独特的视角和精神需求出发，予以尊重，真实地反映他们的日常生活、情感体验和认知发展。

二、涵养美德：释放儿童天性的诗性表达

北大歌谣运动征集民间歌谣的同时将“儿歌”作为一个单独的大类进行收录，足以说明这一时期不仅是对民间文学，更是对儿童文学的重视^[6]。儿歌的分类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本文根据《歌谣》周刊儿歌的内容分知识型儿歌和生活型儿歌两种类型进行探讨。

知识型儿歌旨在传授知识，通过简洁明快的语言向儿童传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这类知识儿歌包括动物儿歌、植物（自然）儿歌等。而《歌谣》周刊中收集的知识型儿歌更侧重儿童天性的引导与发掘，往往将老鼠、蚂蚁、兔子等动物拟人化，描述不同动物的特征，让儿童在幼儿时期认识动物属性，饶有趣味。最有意思的要属《咪咪猫》^[7]：

“咪咪猫，上高窟，金蹄蹄，银爪爪；上树树，捉雀雀；仆辘轳都飞了，把老猫气死了！”

这首儿歌形象地描绘了小猫的模样，通过爬树的捣蛋行为塑造了一个调皮的小猫。这样生动的表现让儿童了解到了一个神奇的动物世界，引起儿童探索的欲望，贴合儿童好奇心理。除动物儿歌外，《歌谣》周刊中的植物（自然）儿歌将花、草等物象拟人化，其特征以活泼的语调描绘自然景象和植物生长过程，帮助儿童感知自然、认识自然。如《小柳树》^[7]：

“小柳树，满盆栽，金花谢，银花开。”

这样一首简短的儿歌不仅描绘了柳树的生长规律还教会了孩子们时间流逝的哲理。这类儿歌以儿童天真的视角来观察万事万物，丰富了孩子的想象力，打开了儿童的自然乐园。

生活儿歌则更多地反映儿童的生活经验和情感，这类儿歌通过生动有趣的形式，帮助儿童理解生活，培养情感。摇篮曲是由母亲吟唱的，哄婴儿安静入睡的催眠曲^[1]。

“我的儿子睡觉了，我花儿困觉了，我花儿把卜了，我花儿是个乖儿子，我花儿是个哄人精。”

母亲温柔地吟唱着摇篮曲，营造了让婴儿能够安心入睡的氛围，安抚婴儿的心灵。儿童从牙牙学语到表达

流畅，孩童间嬉戏打闹时的游戏儿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游戏对于儿童来说，是释放天真本性的乐园，也意味着对儿童天性的解放。

尤其在生活型儿歌中，儿童的成长过程伴随着好奇、模仿，为了在潜移默化中帮助孩子树立价值观，父母们特别是母亲会吟唱一些培养道德素养的治情歌。《歌谣》周刊收集的儿歌包括培养道德素养的治情歌，传承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孩童从小知礼、明礼。如《不讲要》^[8]：“公鸡叫，母鸡叫，给人家东西不讲要。”

该儿歌教导孩童基本的礼仪规范，孩童往往有给人东西想往回要的习惯，这个时候母亲就会教诲孩童，做人要言而有信，不可食言，这是对对方的尊重。这能够让孩童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和形象生动的情节，在传唱中学会为人处事和礼仪规范，传递优秀传统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培养儿童的品德和行为准则。

《歌谣》周刊儿歌的创作理念反映了对儿童天性和中华民族传统礼仪的特别关注。知识型儿歌通过生动的语言和有趣的内容，不仅满足了儿童的认知需求，也为他们提供了探索和理解周围世界的途径；而生活型儿歌则通过日常生活场景，培养儿童的情感共鸣与社会责任感。这两种类型的儿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多样性，既丰富了儿童文学的内涵，也为儿童的情感教育与道德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支持，为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传承夯实基础。

三、民俗传承：扎根底层大众的乡土教育

1914年，周作人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4号刊登搜集童谣的启示：“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尽管对他的呼吁响应者寥寥，但却成为了1918年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先声，其中明确提出了“民俗研究”的术语，还指出了这种研究的乡土教育功能。同时为早期歌谣发展提供了两个基本方向：进行民俗学相关研究和收集大量各地的歌谣以供读者文艺鉴赏^[9]。民间歌谣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真正属于底层大众的文学样式，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带有浓厚的民间色彩。

《歌谣》中的儿歌作为民间歌谣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烈的生活气息，贴近生活，反映民俗。在儿歌创作中融入民风与民俗，实则也是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让孩子们从儿时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习得中华精神。如湖南儿歌《排排坐》^[10]：

“排排坐，吃果果，果果香，吃辣姜，辣姜辣，吃枇杷，琵琶甜，好过年，年又快，如斫菜，菜又干，好上

山，山又远，好看田，田又方，好插秧。”

儿歌中提到的“果果”、“辣姜”、“枇杷”等生活元素，反映了儿童日常生活中的食物，体现了儿歌的生活化和亲切感，使得孩子们能够与日常生活产生共鸣，增强参与感。以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为叙述对象，增强了孩童认识事物、理解事物的本领。而儿歌中“好过年”一词展现了传统节日的氛围，让儿童在欢快的歌词中感受到节庆的欢乐。这不仅传承了民风民俗，也在潜移默化中教育孩子珍视传统文化。

二十四节气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蕴含了丰富的农耕智慧，还与中国民间的习俗、节令和自然变化紧密相连。《歌谣》周刊中收集的儿歌也巧妙地融入了这些节气元素，通过简单的语言传递了季节的变化和农事的规律。通过这种方式，传统文化中的节气不再是枯燥的农事记载，而是通过生动的儿歌形式，融入了儿童的日常生活和文化认知。

“正月来把龙灯耍。二月又把风筝扎。三月来把坟地挖。四月来把秧苗插。五月龙船下河坝。六月扇子手中拿。七月忙把谷子打。八月十五看月华。九月菊花开得天。十月寒梅岭上插。冬月烘笼起了价。胀肚子怕的是腊月八。”^[1]

该儿歌按照月份的顺序一年四季的生活节奏和节令习俗，内容丰富且生动，展现了农民在一年中忙碌的生活。其中提到的“龙灯”、“风筝”、“插秧”、“龙船”等活动，都是传统民俗的具体表现，这不仅让儿童了解民俗活动，还可以激发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尤其是最后一句“胀肚子怕的是腊月八”，通过幽默的方式展现了节日食俗，给孩子们带来轻松愉快的感觉。

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性元素的运用为儿歌注入了文化深度，使儿童在欣赏和学习的同时，增强了对传统价值的认同感。除了体现民风民俗的儿歌，其中也有体现民间儿歌原始性的民生儿歌，从内容上来看，它们深入浅出地反映了时代状况和现实生活中的人情冷暖。

《歌谣》周刊中的儿歌，其创作理念深深根植于大众生活，反映了民风民俗，也反映了民生民本。在创作过程中，儿歌常常与农村生活、节庆习俗、自然景观等紧密相连，体现了特定地域的社会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智慧，是民间文化的生动体现，蕴含着丰富的地方特色和历史渊源。与此同时，儿歌也切实反映了来自人民群众底层

的声音，以它的纯粹与质朴真实的体现社会现实与时代发展历程。

结语

北大歌谣运动是一场大规模的搜集民间歌谣的运动，作为其可视化成果的《歌谣》周刊往往因其民俗学刊物性质被各界学者研究，实际上《歌谣》周刊中儿歌也作为一个单独的类别被广泛地搜集并收录，因此在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为《歌谣》周刊中的儿歌。《歌谣》中的儿歌扎根民间，贴近人民群众，不拘泥于技巧的表达，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真情实感，传承民风民俗。儿歌看似浅显，但深入探寻则会发现其中蕴含着厚重的文化与思想，尤其是作为民间文学，反映了当时的民风、民俗，是一种特殊的“乡愁”，也是弥足珍贵的孩童时期的回忆，不仅为儿童提供了一种愉悦的学习方式，也在无形中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变革。

参考文献

- [1]朱自强.儿童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2009.
- [2]刘半农.刘半农自述[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69.
- [3]曹成竹.鲁迅与歌谣:以北大歌谣运动为参照的考察[J].民族文学研究,2021,39(01):61-69.
- [4]王黎君.儿童的发现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 [5]《歌谣》周刊第36号,1923年12月9日.
- [6]魏蒙.《歌谣》周刊中的儿歌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20.
- [7]葛恒刚.民国歌谣集·(北京大学《歌谣》刊载)[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 [8]张居本.《不讲要》,《歌谣》周刊,1936年9月5日第2卷第14期第4版.
- [9]吴靖阳.在“民俗”与“启蒙”之间:顾颉刚主编《歌谣周刊》始末[J].临沂大学学报,2024,46(03):34-49.
- [10]《歌谣》周刊第16号,1923年4月29日.
- [11]赖伏鸿.《正月来把龙灯耍》,《歌谣》周刊,1924年3月9日第1卷第46期第6版.